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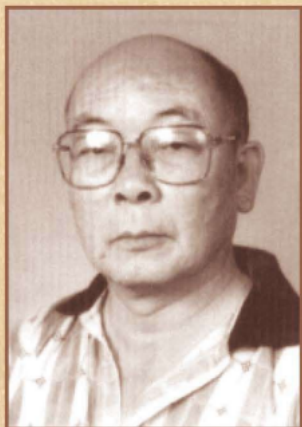
谭茂森文存

谭茂森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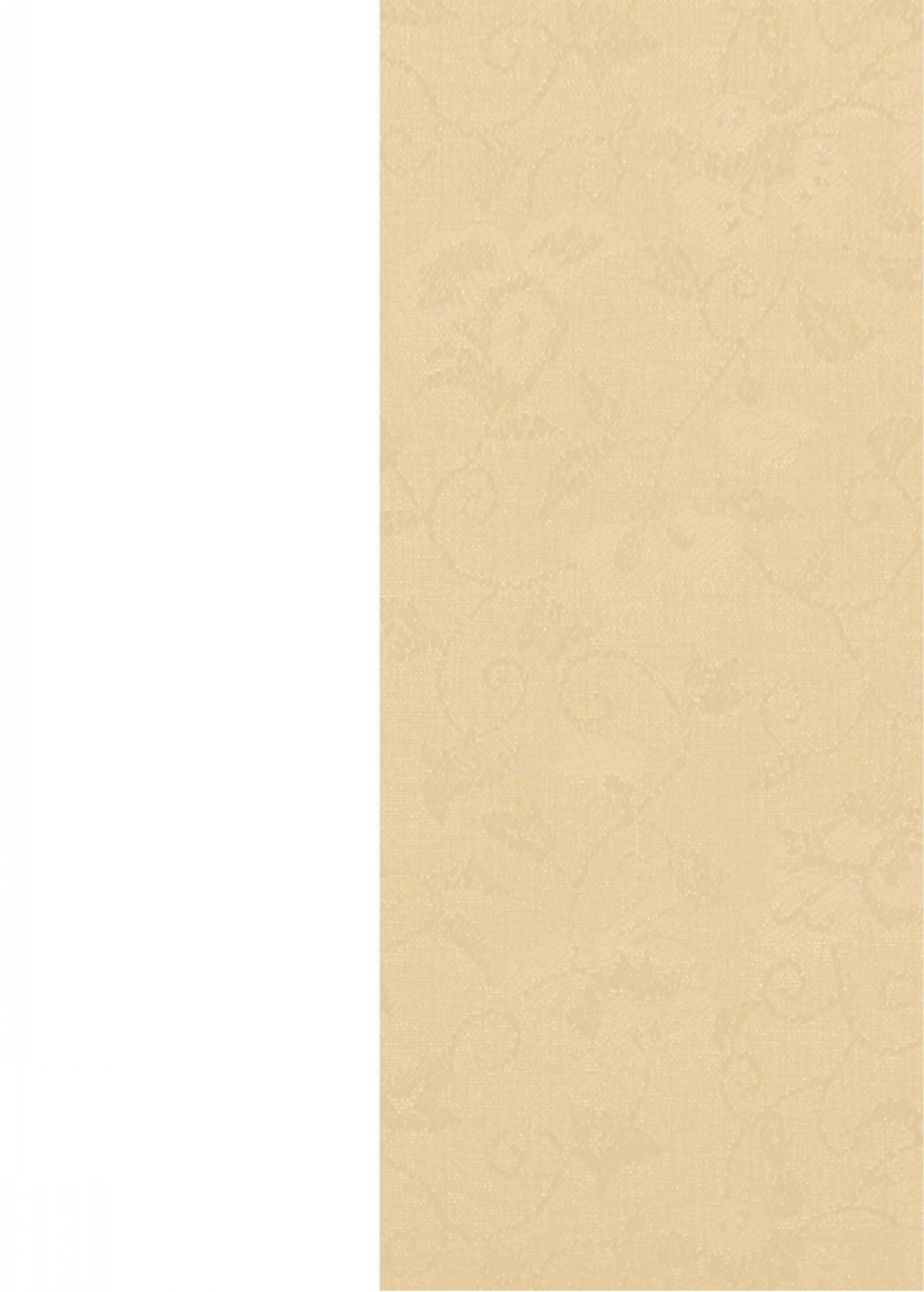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谭茂森，1940年生于云南红河建水古城。1962年，进入云南大学历史系读书。1980年，返回母校母校教书，主讲中国近代史、云南近代史、中国教育史等，兼而舞文弄墨，作文写书。总之，读书、教书、写书，“书”字伴其一生。迄今，谭茂森所撰已刊行者已逾百万字，包括《云南大学医学专修科史》《昆明医学院校史》（任副主编）、《中华谭氏通志》（任编委）等；未刊行者亦有近百万字，有《中国近代史自学指导》《中国教育史纲要》《云南大学综合史稿》等。





ISBN 978-7-5482-2776-2

9 787548 227762 >

定价：42.00元

谭茂森文存

谭茂森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谭茂森文存 / 谭茂森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5482-2776-2

I. ①谭… II. ①谭… III. ①中国历史—文集 IV.
①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0662号

责任编辑: 赵红梅

责任校对: 何传玉

封面设计: 王嫣一

谭茂森文存

谭茂森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淙纶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60千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2776-2

定 价: 42.00元

地 址: 昆明市一二一大街182号(云南大学东陆校区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65031071 65033244

E-mail: market@ynup.com

本书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871-65031071。

序

林超民

这本文存是茂森兄数十年心血的结晶，是他对中国教育史、中国近代史、云南地方史进行研究与教学的独创成果。犹记他每个星期数次到图书馆、档案馆，执着于浩瀚史料中查阅披检，孜孜矻矻，乐此不疲，其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如今将其成果汇编成册，贡献给众多学者与广大读者，能不由衷申庆，同声恭贺！

《中国教育史纲要》是他担任“中国教育史”课程的提纲。他主讲这门课程数年，不仅受到本校学生的欢迎，而且被其他学校礼聘前去讲授。从这个简要精当的提纲，可以看出，茂森兄在中国教育史上的深厚功力。当今的教育经历无数次革新、改革、变更，仍被舆论诟病。回顾中国古代教育史，对于今天教育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温故知新，历史的经验可以成为我们向前迈进的明镜。

茂森兄的论文，如论及孙中山经济思想、梁启超反袁、护国运动、滇西抗战等的，看来都是常见的课题，但是茂森兄且能在常见的论题中独出心裁，别开生面，发人之所未发，道人之所未道，令人耳目一新。

唐继尧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在他被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四镇守使威逼去职后，对他的评价一直是毁誉参半。1950年以后，他被戴上“反动军阀”的大帽后，就被同声斥责。茂森兄跳出固有的窠臼，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据理论证，肯定唐继尧在护国运动中的卓越贡献，赞扬他创办东陆大学的丰功伟业。茂森兄不是曲笔美化，也非故意拔高，而是严肃认真、客观公允地恢复被有意丑化、刻意污损的唐继尧的真实面目，还原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做出卓越贡献的优秀人物的真实面貌，还给这位在历史上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一个公道。这需要有太无畏的求真精神、无私公正的负责态度、洞明世事的睿明胆识。

他的几篇人物随笔，简洁明快，生动传神。这几位平凡而独特的学人因他的记述而不被历史所湮没。

茂森兄的这本书，在史料的运用上独具匠心，在史观的阐发上独出机杼，在研究的方法上独有千秋，确是一本雅俗共赏的著作，必定会受到专家、领导和大

众的欢迎和赞赏。

茂森兄堪称大器晚成。他自幼聪慧，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也有出众的组织能力。早在初中时，他就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水县第一中学大队的首任大队长。初中二年级时，他是个旧、开远、建水、蒙自、石屏五县中国少年先锋队“五校大联欢”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他在中学时是优等学生、数理尖子。他对数学特有兴趣，曾用独特的方式解决数学“难题”，被老师誉为“谭氏定理”。1960年，他高考的成绩名列前茅，本可以到北京大学数学系深造。可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录取到昆明工学院采矿系。两年后，因视力问题不宜从事采矿工作，经过考试，转学到云南大学历史系，从一年级读起。“文革”初期，他因出身“黑五类”，被打入另册，受到无端迫害。1968年底到1969年初，他又因“站错队”被批判斗争了四个月，期间曾被罚跪、游街、拷打。1970年5月，他被分配到广南县山区小学教书。1970年11月，他给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甫仁写信，批评“划线站队”完全背离了毛泽东思想，应该尽快纠正，给受打击迫害的广大无辜群众赔礼道歉。为此，他被昆明市警备区投入大牢，无辜关押近四年。释放后，他到昆明郊区做木工，为山区农民建盖房屋、打造家具。因手艺精巧、质量上乘、价格公道，深受山乡农民欢迎。对于特别贫困的农户，他不仅义务做工，还送钱送物资助。

1980年初，云南省人民政府为他平反昭雪，并安排他到云南大学历史系工作。他担任历史系办公室主任一年多，便转到近现代史教研室从事中国教育史、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与教学。这时他已到不惑之年。

他主讲“中国教育史”“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等课程，为师生同声称赞。

凭着刻苦勤奋、认真负责、踏实严谨，他在科学研究上做出了骄人的成绩。他出版了《云南护国起义》等著作；他还参加编纂《云南大学志》，先后出版《云南大学志·后勤卷》等；他担任副主编的《昆明医学院校史》被誉为云南高教史的典范。他是云南高等教育史上为数不多的专家。

退休后，他依然笔耕不辍，在云南高等教育史的研究中做出新的成绩。这些成果将由云南大学校史办公室送出版社印行。我们期盼他的这些成果尽快问世。

茂森兄与我是云南大学历史系1962级的同班同学，又是云南大学历史系的同事。他是我敬重的好学长，是我学习的好榜样。看到他的新书即将付梓，倍感欣喜，写下数言，向读者推荐，并聊表祝贺之忱。

2017年5月4日

目 录

论梁启超的反袁斗争	(1)
云南护国起义与各界人民声援	(16)
民国时期整理鸡足山寺产案	(28)
鸡足山楞严塔的建筑特点及其碑铭校注	(41)
浅论云南早期的近代工业	(51)
孙中山发展实业实现中国经济近代化的思想	(58)
论抗战时期的滇西反攻战役	(72)
中国教育史纲要	(84)
护国运动中的滇桂战场.....	(121)
云南起义永垂青史 护国功绩光照千秋.....	(130)
滇史巨擘方国瑜.....	(138)
“大学老人”姜亮夫	(140)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记刘西芳副教授.....	(142)
治学求实 为人忠厚 ——记赵春谷教授.....	(145)
唐继尧与云南大学.....	(147)
董泽——杰出的白族高等教育家 ——纪念云南大学九秩周年校庆而作（1923—2013）	(150)

边疆高等教育之嚆矢 现代高级人才之摇篮

——私立东陆大学创办纪实兼云南大学 75 周年校庆纪念（1923—1998）

..... (161)

早期的云大医院及其善举..... (187)

董澄农与国立云南大学医学院澄农馆..... (193)

后 记..... (199)

论梁启超的反袁斗争

辛亥革命后不久，梁启超结束了长达十四年的海外流亡生活而回到祖国。开始，他对袁世凯寄望颇深，一度吹嘘袁为“功在社稷，名在天壤”，并尽弃戊戌变法中袁氏穷凶极恶地出卖维新派之前嫌，幻想依靠袁的地位和权势以实现自己怀抱多年的救国救民的理想和抱负。但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回国不久，他目睹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独裁专制、倒行逆施，即深感不满，而当袁氏妄图推翻共和、复辟帝制时，他终于转变立场，奋起反袁，积极投身于护国讨袁的斗争中。

从拥袁到反袁是“流质多变”的梁启超一生中最重要的转变，也是他从政生涯中的光辉时期。然而在过去的有关论著中对此问题的研究和评价，或者语焉不详，或者贬多于褒，显然这是不公正的。恩格斯指出：“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① 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价梁启超的反袁斗争，这里主要依其在护国时期所发表的部分论著、函电，做些粗浅的分析和探讨，不妥之处，恳乞方家不吝教正。

一、揭露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

1912年3月，在中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爬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开始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这位前清的内阁总理大臣，尽管他曾指天发誓“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决心“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② 但他上台伊始，就无时无刻不在做着皇帝美梦。为此他先后镇压了“二次革命”，解散了国会，废除了《临时约法》，悍然承认“二十一条”。1915年，他自认为复辟帝制时机已到，于是暗中指使洋博士古德诺之流抛出《共和与君主论》，敲响了帝制丑剧的开场锣鼓，紧随其后帝制御用机关“筹安会”出笼，公开叫嚣：“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97页。

^② 沈云龙主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页。

不用君主国体。”^① 经过一阵紧锣密鼓之后，至 1915 年年底，袁世凯终于从幕后跑上前台，公开接受帝位，从而使他自编、自导、自演的这出丑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梁启超回国后，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曾先后担任袁政府的司法总长、参议院参政、宪法起草委员等要职，很想施展抱负，大干一场，如他所说：“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② 因此他在回国前夕和回国以后最初几年，先后发表了《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财政问题商榷书》《内阁大政方针宣言书》《呈请改良司法文》《余之币制金融政策》等一系列重要文论，并多次上书袁世凯，希望袁氏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领导中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民主富强的新国家。但由于袁世凯独裁专制，梁启超的幻想很快破灭，尤其随着袁氏帝制活动的酝酿与公开，梁对袁的态度从拥护转为不满，再从不满意转为反对，并且日趋明显、激烈和坚决。素有“舆论界骄子”美称的梁启超，首先用他那支恒带感情的笔尖写了大量传诵一时、颇负盛名的文章，对袁氏复辟帝制的阴谋活动和滔天罪行做了辛辣的嘲讽、猛烈的抨击和深刻的揭露。

梁启超的反袁始于 1915 年年初，其时袁氏长子袁克定为试探梁对帝制的态度并进行拉拢，曾宴请梁于北京汤山，席间，袁“谈次历诋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体求我赞同之意。……语既格格不入，余知祸将作，乃移家天津”^③。一开始，敏于政治、善观风云的梁启超便警觉地发现，“变更国体”的帝制活动必将酿成弥天大祸，故决定退避三舍，既免牵连，又可静观。

随着袁氏复辟帝制的加紧进行，梁启超考虑到袁氏的前途、国家的未来和自己的理想，深感不安，忧心如焚，不得不上书直谏，于同年四月投递了“椎心泣血”“墨与泪俱”的《上大总统书》^④。毋庸讳言，由于此前梁与袁的关系和此书写于帝制公开前，因而书中不免流露梁对袁的规劝、惋惜之意，如开篇所说他对袁“私衷感激，不知所酬……缅怀平生知遇之感”等，但其上书的主旨却是比较明确的，他写道：“国体问题已类骑虎，启超……静观大局，默察前途，愈思愈危，不寒而栗。”文中正告袁世凯，若还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像历史上短命

① 《筹安会宣言》，载《护国文献》下册，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032 页。

② 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88 页。

③ 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143 页。

④ 关于此书的上呈时间，孟祥才《梁启超传》认为在 1915 年底梁离津南下前夕，而《梁启超年谱长编》和李国俊编《梁启超著述系年》均认为在 1915 年 4 月末，今从后说。

而亡的秦始皇、隋炀帝一样，仅恃“威力”而失人心，那么等待袁氏的必将是“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①。文章酣畅淋漓，一针见血。名为“忠谏”之书，但其字里行间无不闪耀着反袁的光彩。

袁世凯和历史上的一切反动派一样，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面对全国人民的反袁斗争，他不但没有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推行帝制。1915年8月，称帝心切的袁世凯为了早日黄袍加身，竟借洋博士、筹安六君子之口，公开上演复辟帝制丑剧。此时梁启超感到忍无可忍，于是拍案而起，奋笔疾书，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这是他公开反对袁氏帝制的第一声，因系公开发表，梁仍碍于与袁的旧情，故语气显得有些缓和，同时更由于长期以来梁思想深处始终主张改良而反对革命，重视立宪而轻视共和，故文中有不少贬低共和之词，他曾自白：“鄙人于共和国体，非有所偏爱，而于其他国体，非有所偏恶。”“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但是纵观全文，梁启超反对袁世凯变更共和制度，复辟君主专制的立场却是十分鲜明的。他明知帝制主谋不是别人正是袁氏自己，却明知故问：若行君主制，则谁当皇帝？由“今大总统”吗？而“今大总统”已屡次宣言不肯帝制自为。以袁之矛攻袁之盾。他还进一步指出：国体一变，宪政不行，“则乃是单纯之君主论，非君主立宪论也。既非君主立宪，则其为君主专制”。在这里，他一语道破了“变更国体”的实质即是复辟君主专制制度，而这是他所一贯坚决反对的。诚然，《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于袁氏的帝制自为除了抨击和揭露外，也无不惋惜、忠谏之词——这正反映了梁启超思想深处的矛盾心理，但其结论却是明白无误的：“惟在现行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②所谓“现行国体”即辛亥革命后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鼓吹君主立宪，辛亥革命时又高唱“虚君共和”，而在袁氏图谋推翻共和、复辟君主专制的严峻时刻，却挺身而出，维护共和，这不仅是梁启超政治思想上的一大进步，也表明了他反袁的坚定立场。尤需指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中原写有“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赞成（帝制），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后经友人相劝，始删去。^③由此可知，所发表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中虽有许多矛盾而不可解的观点，但在梁的思想深处其反袁态度却是十分坚定的，后来许

① 《护国文献》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183页。

② 以上所引，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③ 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著《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21页。

多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916年3月，由于护国战争的迅猛发展，继云南之后，贵州、广西相继独立讨袁，走投无路的袁世凯眼看大势将去，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而独立各省为了进一步揭露袁氏的帝制阴谋，特将袁氏党徒伪造民意拥袁为帝的电文汇集影印公之于世，梁启超就此写了一篇《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文章开门见山，单刀直入：“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袁氏及其党人，纵有万手，当莫能掩，纵有万喙，当莫能赖。……此果何等妖孽，何等罪业。”痛快淋漓地把袁氏盖在“帝制自为”的妖魔罪孽上的所谓“民意”“公心”等遮羞布撕得一千二净，把袁氏及其党徒的丑恶嘴脸充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文章进一步指出：“质而言之，此次皇帝之出产，不外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由一人在幕内牵线，而其左右十数嬖人蠕蠕而动。”梁启超用他那支生花妙笔形象生动、惟妙惟肖地勾画出一幅洪宪帝制群丑图，袁氏依靠利刃的威胁、金钱的利诱，躲在幕后操纵控制，而唆使其一小撮党羽，即所谓“筹安六君子”“七凶”等“十三太保”者流跳上台群魔乱舞，而实际上不过是袁氏一人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出傀儡丑剧而已。接着梁启超以大量的事实、生动的比喻，说明袁世凯是一个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两面派，是一个专营偷窃的过街老鼠和背叛民国的窃国大盗：“袁氏一生，其言与行，无一不相违，其心与口，无一而相应。”“今乃专用鼠窃伎俩，昼伏夜动。东偷一孟，西偷一钵。以前清托孤之大臣而盗卖前清，以民国服务之公仆而盗窃民国。”^①这里梁启超虽因其固有的改良思想而把“前清”与“民国”相提并论，但却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袁氏的阴险奸诈的凶残面目。

在举国一致的愤怒讨伐声中，1916年6月，袁世凯这位寡廉鲜耻的洪宪皇帝终于一命呜呼，结束了其罪恶可耻的一生。至同年底，余恨未消的梁启超又发表了《袁世凯之解剖》一文，对袁做了入木三分的刻画，把他定为“中世史黑暗时代东方式之怪魔的人物”，他的“关门做皇帝”犹如称雄长于甕中的“醯鸡”^②。梁还断言，袁是当时中国一切祸乱的根源和最坏最恶劣的统治者。“中国祸乱种子，全由袁氏所播，袁氏多统治一日，则祸乱之程度加深一日。”“盖国中任举一极恶之人，其恶却不能有加于袁氏。”^③对袁世凯做了斩钉截铁的盖棺定论。

① 以上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皆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②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③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

二、梁启超从拥袁转向反袁的原因

梁启超从拥护袁世凯转变到反对袁世凯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必然的原因，归纳起来大约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两种意识形态即地主阶级的君权思想与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冲突的结果。

袁世凯出身于地主、官僚和军阀三位一体的家庭，从小深受孔孟三纲五常等封建思想的熏陶。青年时代，为了荣宗耀祖而投靠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军阀，成为“有造之士”。甲午战争后主持小站练兵时，曾编《劝兵歌》，竭力宣扬“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①。戊戌变法中，为了显示对清王朝的效忠而可耻地出卖维新派，从而博得主子的嘉奖而官运亨通，飞黄腾达，成了大清帝国的忠实臣仆。清末，革命风潮一日千里，腐朽的清王朝面临灭顶之灾。当此之时，袁世凯上书西太后，提出“拨本塞源”四策，力主镇压革命，宣扬“忠君爱国主义”，^②全为西太后所采用。足见其忠君思想之根深蒂固。辛亥事起，他眼看清王朝大势已去，绝难起死回生，于是忠君思想一跃而为帝制自为思想，妄图取清王朝而代之，建立袁家王朝而一统天下。他采用卑劣的两面派手法，以革命党压清帝退位，以清帝退位逼革命派交出政权，在攫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后，旋即做起皇帝梦，短短三年，即由临时大总统变为正式大总统，进而成为终身大总统，再而成为洪宪皇帝。他在《公布改革国体请愿之命令》文中赤裸裸地宣称：“中国二千余年，以君主制度立国，人民心理，久定一尊。辛亥以后，改定共和，实于国情不适，以致人无固志，国本不安。……惟有速定君主立宪（实为君主专制——引者注），以期长治久安……君主立宪为救国良图，必宜从速解决。”^③这段不打自招的供状充分暴露了袁世凯极端仇视民主，梦想复辟帝制的大地主大买办的阶级本质。

梁启超虽也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但他较早地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青年时代积极参加戊戌变法运动，成为维新派中著名的思想家和宣传家。他曾猛烈地批判了中国两千年来的君权思想：“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④激烈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憧憬“君权与民权合”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从此民权思想成为他为之奋斗终生的远大理想。20世纪初，流

① 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第4卷，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刻本，第5页。

② 参见袁世凯《密陈大计以遏乱萌折》，故宫档案。

③ 《护国文献》下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6~1037页。

④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

亡海外的梁启超深受西方民权思想的进一步感染，其政治主张发展到了一个高峰，甚至从君主立宪一跃而到民主共和。1902年他发表了《拟讨专制政体檄》，公开声明与专制政体誓不两立：“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有专制则无我辈，有我辈则无专制。我不愿与之共立，我宁愿与之偕亡！”号召国民：“组织大军，牺牲生命，誓翦灭此而朝食。”^①为了变革社会，推翻君主专制制度，不惜采用“破坏主义”即革命手段，甚至采取“有血之破坏”即暴力革命。他断然表示：“为两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②并曾主动约请孙中山商谈进步党与国民党合作，共同进行革命的大计。虽因他人作梗，最后合作未遂，但他仍对孙中山表示：“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③到了辛亥革命前后，他因片面夸大中国人民的所谓“四大弱点”，即“爱国心薄弱”“独立心柔脆”“公共心缺乏”和“自治力欠缺”^④而认为中国人缺乏实行民主共和制度的资格，其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民主共和倒退为君主立宪，再退到“开明专制”。但尽管如此，他仍念念不忘立宪政体，而立宪恰恰就是近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根本标志之一。

由此可知，袁世凯和梁启超分别属于不同的阶级，各自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一个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总头子，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和捍卫者，两者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和利害冲突，所以当袁氏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推行帝制，妄图变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为地主阶级的君主专制的关键时刻，梁启超就不能不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站到反袁护国的行列中，成为一名呼啸向前、冲锋陷阵的斗士。

第二，革命派和全国人民反袁斗争的推动。

在反对袁世凯独裁卖国、复辟帝制的斗争中，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始终高举革命的大旗，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但也毋庸讳言，孙中山也曾被袁的假象所迷惑，1912年他就说过：“欲治民国……而袁总统适足当之。故余之荐项城，并不谬误。”^⑤但时隔不久，上海滩的枪声、宋教仁的血案即惊醒了孙中山，他愤怒谴责“袁氏将拨专制之死灰，而负国民之付托”，毅然表示“誓必去之”^⑥，断

① 李华兴、吴嘉勋主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0页。

② 李华兴、吴嘉勋主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115页。

③ 李华兴、吴嘉勋主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

④ 梁启超：《论中国国民之品格》，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⑤ 《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5页。

⑥ 邹鲁编：《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册，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038页。

然决定以武力讨袁。从此孙中山就像当年反清一样，坚定不移地走上了武装反袁的道路。1913年“二次革命”虽然失败，但他毫不气馁，于次年在日本重组中华革命党，建立中华革命军，并派人回国策动军事讨袁，决心“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1914年秋发布《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指斥“袁贼苦吾国民久矣！”坚定地表示要“爰率义旅，誓殄元凶，再奠新邦，期与吾国民更始”。^①这篇讨伐檄文实际上成了护国反袁的先声。1915年8月筹安会出笼后，孙中山即明确指出袁氏“私与日人结托，急欲制其王冠”^②。同年底，袁氏承认帝位后，孙中山立即发表第一次《讨袁宣言》，痛斥袁世凯“背弃前盟，暴行帝制”，“既忘共和，即称民贼”，发誓要“戮此民贼，以拯吾民”。号召国民“犁庭捣穴，共戮国贼”，^③毅然肩负起领导全国人民反袁斗争的历史重任。

以黄兴为首的另一部分革命派，虽未加入中华革命党，但也组织“欧事研究会”，积极从事反袁斗争。黄兴曾揭露“袁世凯所行的暴政，犹甚于专制君主”。坚决表示“非先去袁氏不可”。^④许多研究会会员更直接卷入了军事讨袁的斗争，李烈钧还担任了护国第二军总司令。

在袁世凯专制独裁的淫威统治下，全国各阶层人民反袁斗争风起云涌，猛烈地震撼着袁氏的统治基础。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912年爆发于河南的白朗起义，该起义历时三年，遍及五省。义军谴责袁政权是“神奸主政，民气不扬。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后期更猛烈抨击“袁贼世凯，狼子野心，以意思为法律，仍欲帝制自为”。^⑤表现了鲜明的反封建反帝制的民主革命色彩。

目睹国中各党派、各阶层人民轰轰烈烈的反袁浪潮，梁启超绝无可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虽因其由来已久的改良思想和一度对袁的幻想，他曾不止一次地指责革命派是什么“乱暴派”，其主张是“暴民政治”，并攻击“二次革命”造成“生灵涂炭”“国事日非”等等，但其对袁政权的不满却是显而易见的。他回国不久，即发现在袁氏统治下，“国内种种焚乱腐败情状，笔安能罄”，“吾在此日与妖魔周旋，无论何路皆行不通”，慨叹“惟以忧患终其身而已”。^⑥而在其公开讲演中，更直言不讳地表示“吾党对于临时政府之设施，无一能满意者”，之

①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7~108页。

② 张其昀编：《国父全书》，（台北）“国防研究院”编印，1963年，第595页。

③ 胡汉民主编：《总理全集》第2集，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14~15页。

④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87、383页。

⑤ 杜春和编：《白朗起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24、225页。

⑥ 梁启超：《与烟儿书》，载丁文江、赵丰田编著《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3~664页。